

## 崢嶸歲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與實踐（1949-2000年）

連浩濤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 第二講 「多、快、好、省」：「大躍進」與黨內矛盾的激化（1958-1965年）

#### 1. 「大躍進」

- 「躍進」：最先提出「躍進」這個口號的是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
- 「多快好省」：1955 年底，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個文件中，最先出現了「快、多、好、省」的提法；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建設「多、快、好、省」四個方面的要求；3 月 13 日，《人民日報》更將「多快好省」方針定性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方向」。
- 動機：毛澤東 1956 年提出「以蘇為鑒」，隨即急於開闢一條獨特的、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
  1. 決定採用「趕超型」戰略，即依靠國家權力以最短時間進入工業最發達國家行列的發展方式。為了實現後來者追上的目標，尋求捷徑、超越常規、進行創新以實現趕超是理所當然的事；
  2. 要破除「封建迷信」和「洋迷信」（這包括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迷信，對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迷信，甚至對馬克思的迷信）。1958 年 5 月，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馬克思沒有造中國這樣大的革命，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

1960 年 7 月，毛澤東面對「大躍進」失敗時說：「現在人家對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懷疑，這不能說沒有道理。這些是新鮮事物，我們正在進行試驗，我們進行各種各樣的試驗，無非是想把我們中國搞得更好一點，發展得快一點。我們想試試是不是只有蘇聯那個辦法是唯一的辦法？我們想，除了蘇聯的辦法，是不是根據中

國的情況還有更好一些的辦法、更快一些的辦法？無非是這麼一個想法。國內工作決定我們在國際上的發言權，我們要埋頭苦幹，把國內工作搞好。」

- 發動群眾來加快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淵源：由於毛澤東不願照抄別國經驗，但由於中共沒有新鮮的經驗，故在建設年代回歸其革命經驗是可以理解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回顧「大躍進」的發動時說：「我們黨從土地革命時期開始，運用大搞群眾運動的方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戰爭問題，確實得心應手，無往而不利。在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大搞群眾運動，雖遇到很大阻力，但終究戰勝了阻力；遺留問題雖不少，但總算沒有出大亂子。這使毛主席和我們這些人，堅信這套傳統工作方法也可以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 訂定生產指標（製造平衡），目的是要突破指標（破壞平衡）。毛澤東：「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
- 「畝產萬斤」的「衛星田」：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創造了畝產13萬斤的奇跡！」→1958年底：標榜「少種、高產、多收」之「三三制」出臺（即現有農耕地1/3種莊稼；1/3種樹種草，發展林牧業；1/3休閒，以培養地力）→1959年：全國播種面積顯著減少，糧食總產量也明顯下降。
-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追求大規模，認為公社規模越大越有優越性；「公」是把一切生產資料乃至生活資料收歸國有，實行公社一級核算）。  
「五保」（為缺乏或喪失勞動力的老、弱、孤、寡、殘疾社員提供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的福利）。
- 廬山會議及八屆八中全會議（1959年7—8月）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顯示毛澤東時代的兩項特色：
  - 儘管毛澤東一貫「左」傾，但當他察覺到政策在執行上出現了「左」的毛病時，便會帶頭糾「左」，不過，由於糾「左」往往引出右的觀點，糾「左」終以反右收場；

- 毛澤東犯了錯誤，只能由他自己說，別人指出他的錯誤，就是僭越。毛自己在 1958 年八屆六中全會上就談論過「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情緒的危險性」，但這樣的話只能由毛自己講，彭德懷講這句話就是僭越，就是別有用心。
- 廬山會議後開展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全國有 380 萬黨員、幹部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國人民解放軍內部也劃定了 17,200 餘人。
- 「大躍進」期間各種群眾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帶來的問題：
  1. 資源和生態平衡的破壞----
    - 因為要大煉鋼鐵，所以發動群眾砍伐林木，結果對森林造成極大的破壞；
    - 大規模的興築水利工程、圍剿麻雀運動也徹底破壞了生態系統；
  2. 資源的浪費----
    - 1958 年，全國有 1.9 億農民投入水利工程和大煉鋼鐵運動，到秋收季節，由於收割主要靠老弱婦殘，故當年的農作物有 10% 左右未收回來；
    - 由於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鼓勵「放開肚皮吃飽飯」，甚至開流水席，本社社員隨到隨吃，外社社員亦可享受免費就餐，因此，很多公共食堂半個月就吃掉了三個月的口糧。據估計，1958 年農民免費吃食堂所浪費的糧食相當於當年農村供應糧食的 11%；
  3. 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消費與積累比例失調、工農業比例失調、工業和交通運輸比例失調等等；
  4. 對農民掠奪----全國出現「一平二調」（貧富拉平及公社無償地調撥生產隊的勞動力、土地、物資和糧食）的現象。中央農村工作部 1961 年 8 月的報告指出，公社化的幾年裏，平均每農民被平調財物為 48.89 元，相當於 1961 年農民平均消費水準 68 元的 71%，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 1958-1961 年的糧食產量：
  - 1958 年----4,000 億斤（公佈是 7,500 億斤）；
  - 1959 年----3,400 億斤（當時估計產量是 5,100 億斤），比 1958 年 -15%；
  - 1960 年----2,870 億斤（當時估計產量是 3,700 億斤），比 1958 年 -28.25%；
  - 1961 年----2,950 億斤（大約是 1952 年水平），比 1958 年 -26.25%。

- 1959-1961 年糧食超額徵購：因地方幹部虛報生產數字，令國家要求各地區加大徵購指標，結果造成國家統購穀物後無足夠餘糧留給農民；
  - 1954-1958 年----糧食徵購數佔糧食總產量 20%；
  - 1959-1961 年----糧食徵購數佔糧食總產量 34.4%（1959 年達 39.6%）。
- 國家在糧食減產時期還實行高徵購的原因：
  1. 要高出口----換取外匯以發展重工業；
  2. 要高儲備----要準備打仗；
  3. 還外債；
  4. 援外；
  5. 要支持城市的糧食供應。
- 1959-1962 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2000-4000 萬人。

(1) 官方公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 1958 年----172 萬；
- 1959 年----475 萬；
- 1960 年----1,109 萬；
- 1961 年----300 萬；
- 1962 年---42 萬；
- 1958-1962 年----2,098 萬（災情最嚴重的省分包括河南、安徽、山東、貴州）。

(2) 楊繼繩：

- 「1958—1962 年期間，中國餓死 3,600 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 4 千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的人數，共計 7,600 萬人。」
- 大饑荒導致死亡是極權體制所造成的：（1）各級政府對外封鎖饑餓的消息；（2）郵局扣起向外求助的信；（3）公安局封鎖村口不得外逃。（見楊繼繩：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

- 鄧小平：「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 「大躍進」的社會（群眾）基礎——錢理群按楊繼繩所提供的資料作分析後，列出捲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熱潮的六種人：
  1. 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
  2. 把黨的目標看作是自己目標的熱血青年；
  3. 希望改變自己困境（起碼能「放開肚皮吃飽飯」）的工農群眾；
  4. 農村的流氓無產者（痞子）和「吃運動飯」的人；
  5. 投機鑽營分子；
  6. 被迫自保而跟風者。

錢理群：這場運動是不可以用「全民擁戴」或「全民受騙，被動參與」這類絕對化的簡單判斷來概括的（見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2. 「大躍進」後黨內矛盾的激化（1961-1965年）

- 毛澤東退居第二線，是指政治局第二線：毛澤東後來解釋說：「我負責的就是【把領導層】分工為第一線和第二線。我們為什麼要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呢？第一個原因是我的健康不太好；第二個原因是蘇聯的教訓。馬林科夫【G.M.Malenkov】不夠成熟，史達林死前，他沒有使用過權力。每一次他一敬酒，他就奉承、諂媚。我要在我死前建立他們【劉少奇等第一線領導人】的威望。」
-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1961年1月）：批准了「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毛澤東號召令「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所謂實事，

「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陳雲語）。

- 紓解民困的農業政策：
  1. 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從 1961 年夏收起，全國糧食收購價平均提高了 20%）；
  2. 減少糧食徵購數量（1962 年的糧食徵購數僅相當於 1959 年的 54%）；
  3. 降低農業稅（農業稅的實際負擔率，即農業稅正稅和地方附加的實際稅額佔農業實際收入的比例，從 1959 年的 14.3% 降至 1962 年的 8.7%）；
  4. 從 1961 年開始大幅削減糧食出口；
  5. 實行優先進口糧食政策----1961—1965 年，每年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進口糧食，或通過法國轉口購買美國糧食約 500 萬噸左右。
- 「包產到戶」：在土地所有權歸集體的條件下，以個別農戶為單位進行經營，把收穫的糧食（繳納國家公糧部分除外）歸農民自己支配的生產責任制。
- 「非集體化」農業政策：1967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一文，把農村集市貿易、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稱為「三自一包」，又把這些政策說成是「妄圖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 知識分子政策：1962 年 3 月初，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上「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3 月下旬，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已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把他們看做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
- 1960 年代初的「調整」政策，可概括為四個字：「猛抓」與「猛退」：
  - 「猛抓」----「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周恩來語），即一切以「解決吃飯問題為中心」；
  - 「猛退」----一切和老百姓吃穿用無關的，通通退：（1）工業要大後退；（2）城市人口要大量下放到農村；（3）高積累要大幅度下降；（4）農業要「非集體化」；（5）思想文化戰線要退到反右前一樣。

鄧小平著名「貓論」的原話是：「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

- 1961 年，毛澤東親自做了兩個「退」的決定（到年底又認為已經退得差不多了，不能再退）：
  1. 解散現在被他指罵為「致命的腫瘤」的公社食堂；
  2. 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退至生產隊（即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所有制形式）。
- 毛澤東一直反對「包產到戶」。他對秘書田家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1. 毛澤東擔心「包產到戶」會「把五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
  2. 毛澤東擔心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包產到戶」會導致人民公社全面解體。
- 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躍進」失敗後農民對基層幹部不滿的原因：
  1. 幹部在糧食方面對農民進行剝奪；
  2. 幹部肆無忌憚地多吃多佔；
  3. 幹部（尤其是基層組織的第一把手）對農民實行全面專政。
- 開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整風運動----「文化大革命」從文藝領域開展，表明江青的影響是關鍵性的。
- 抓緊軍權--- 得到國防部長林彪的幫助
  - 1962 年初，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毛澤東的思想總是正確的」，經濟困難的發生「是由於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講到大躍進的得失時，林彪概括地說：「從表面上看失大於得，但是從實質上看，從長期看，得大於失。」
  - 林彪把軍隊打造成「毛澤東思想的學校」。

- 1964 年夏天，林彪批評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領導全軍開展練兵和比武運動是鼓吹錦標主義、形式主義，有違「突出政治」的基本原則。羅瑞卿則反駁說：「政治好了，也要把其他工作搞好」，「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提不高，那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空頭政治家。」  
1965 年，毛澤東指出：「羅（瑞卿）個人獨斷，羅是個野心家」，「過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復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則」，「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 毛澤東決定不讓劉少奇接班：
  - 1961 年 9 月 24 日，到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問毛澤東：「你的承繼人是誰？」毛回答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 1970 年 12 月，美國友好記者斯諾（Edgar Snow）問毛澤東：「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回答說：「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的看法：
  - 「階級」：就馬克思主義而言，「階級」是指一個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 傳統階級鬥爭：矛頭指向「黑五類」。
  - 毛澤東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後的階級觀念：從人們的世界觀來看其階級屬性，即以意識形態作為界定「資產階級」存在的基本準則。他解釋說：「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於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資產階級是可以再生的。」

「官僚主義者階級」：所謂一個「藉權營私」的「官僚特權階級」。當時確實存在因壟斷政治權力而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利益集團，但若從生產資料的佔有和分配角度來看，「官僚主義者階級」在 1960 年代中國是不存在的。